

10(8)/10 次 10/1

文學研究集刊

第一冊



文學研究集刊

第一冊

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北京

出版說明

我們決定以集刊的形式來發表我所研究人員的部分論文。凡已在其他报刊上刊載过的一律不再收入。

除研究論文外，这个集刊还打算發表一些可供文学研究工作者參考的翻譯的或者資料性的文章。

我們誠懇地期待着批評和指教。

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

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字第003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書号422 字數105,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張4占 插頁4

1955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數19501—30000册

定价(5)0.43元

目次

出版說明

吳敬梓的小說「儒林外史」

何其芳（一）

「三國演義」簡論

陳涌（三七）

胡適文學思想批判

毛星（四一）

古典文學研究中胡適怎樣歪曲文學的社會意義

胡念貽（五三）

批判胡適誇大他個人在新文學運動中的作用

曹道衡（二四）

吳敬梓的小說「儒林外史」

何其芳

一

敏軒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風雅慕建安，齋粟懷昭明。
囊無一錢守，腹作乾雷鳴。時時坐書牖，發詠驚鸛庚……

吳敬梓的朋友程晉芳，曾在一首詩裏這樣描寫了吳敬梓的志趣和生活。六朝並非盛世，然而我國古代的詩人却喜歡稱道它，把它當作一個文采風流著名的時代。吳敬梓中年以後移居南京，那正是六朝的故都；而他在當時又是以擅長詩賦這樣兩種盛行於六朝的文學爲人所稱。他的「文木山房集」保存了他的詩賦的一部分，我們至今仍可讀到。正如那集子的一篇序裏所說，和當時那些把詩降低爲無聊的應酬工具的假詩人不同，他寫的詩「大抵皆紀事言懷，登臨弔古，述往思來，百端交集」

●「孟子：萬章」：「書曰：祇載見辟腹，饗饗齊栗。」趙岐注：「饗饗齊栗，敬慎戰懼貌。」這是說舜爲天子以後，對他的父親瞽瞍仍很恭敬。梁昭明太子蕭統事父亦孝謹。「齊栗懷昭明」，就是說吳敬梓懷念梁昭明太子很講究孝道。吳敬梓亦重孝道，故云。

之作，就是說還是有內容的。然而，我們今天看來，他的傑出的文學的才能，他的獨特的創造性，以至他的詩人的懷抱，都主要地表現在他的小說「儒林外史」裏面，而並不在這些韻文。

程晉芳說吳敬梓生在清代而抱有六朝人的情懷，並非僅僅稱讚他的文采風流，還有說他滿肚皮不合時宜的意思。在這點上，他是對他的朋友頗有了解的。生活在十八世紀初年到五十年代之間，生活在滿清那樣一個最後的封建王朝的統治之下，對當時的醜惡的現實深為不滿，不肯和它妥協，而又沒有出路，於是不能不從遼遠的古代選擇某些信念某些人物來作為他的理想，作為他反對當時的社會的憑藉，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的確表現出來了這樣的理想。這樣的理想支持了他對於許多醜惡的事物的批判，同時也決定了他所描寫的某些理想的無力。但他的全部理想，除了這樣的部分而外，還有另外一些值得我們重視的東西。這就是他的某些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思想。決定「儒林外史」的價值的並不是他的那些以復古面貌出現的理想，而是他的尖銳的對於封建社會的不合理的事物的批判，他的可貴的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思想和他的卓越的現實主義的藝術的成就。

正是由於這樣，中國人民才把「儒林外史」當作自己的遺產來加以珍視、閱讀和研究，並且熱烈地來紀念它的作者的逝世兩百周年。

二

「儒林外史」批判了一些什麼醜惡的事物呢？

讀過這部小說的人都會回答：它首先批判了當時的科舉制度。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用考試詩

賦或經義等辦法來選拔封建統治的忠實的擁護者這樣的制度，本來創始於隋唐。但到了明代，這種制度有一個變化，就是變為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的特點一在於它的題目限於四書五經以內的文句，而且作者要摹倣古人的口氣，不准稱引三代以下的事情，不准侵犯題目以下的文字的意思；二在於它的格式是完全規定死的，甚至字數都有一定的限制。這樣的變化是反映了封建地主階級日益感到它的統治不很鞏固，因而它的統治辦法日益嚴厲的。這種科舉制度所要求的是沒有頭腦的鸚鵡式的學舌者，是完全循規蹈矩的順臣。明末清初的有名的思想家都是反對以八股取士的制度的。然而，他們不可能理解這種制度是封建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的必然產物，因而他們常常只把它當作一個單純的取士制度來加以批評，而且他們中的某些人更企圖用一些改良的辦法來加以補救。吳敬梓對於科舉制度的根本認識雖然也不能說超過了當時的時代限制，但他通過生動的文學的形象，把這種制度的毒害揭發得很深，而且提出了一些完全和它對立的思想，因而就比某些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批評得更為徹底了。

吳敬梓把「儒林外史」的第一回的回目標明為「說楔子敷陳大義，借名流隱括全文」，這就是說他著書的用意，他所反對的和肯定的是什麼，都在這第一回裏明白地提了出來。他一開頭就表示不贊成當時的熱中功名富貴的人，後面更具體地指出用五經四書八股文取士的辦法不好，會使讀書人「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而他所歌頌的乃是王冕那樣的人物。在第一回後，「儒林外史」就寫了周進、范進這樣兩個人物。他們本來是兩個比較忠厚老實的人，兩個考到五六十歲還沒有考取秀才的可憐蟲。周進連私塾教師也做不成的時候，爲了餬口，不得不給一夥商人做記賬先生。但

他仍然那樣熱中科舉，見到貢院裏面的號板就悲痛得要撞死。那夥商人把他救活以後，他不住地「號咷痛哭」，「直哭到口裏吐出鮮血來」。他的悲慟就是由於「苦讀了幾十年的書，秀才也不會做得一個」。那夥商人答應湊一筆錢，替他捐了一個監生，使他取得和秀才一樣可以進貢院裏面去考舉人的資格，他就感激得爬到地下磕頭，說「變驛變馬，也要報效」。范進考舉人前後那一段，更加寫得淋漓盡致。范進向他的丈人胡屠戶借盤纏去考舉人的時候，胡屠戶罵了他一個「狗血噴頭」，說他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但范進終於到城裏去應考了。回家時，家裏已經餓了兩三天，他不得不拿一隻生蛋的母雞到集上去賣，好換幾升米來煮粥吃。正當他在集上「抱着雞，手裏插個草標，一步一跛的東張西望，在那裏尋人買」的時候，却不料報喜人已經到了他家，報他中了舉人。鄰居到集上去告訴他，他還以為是開他的玩笑。直到他回家來親自看見了報帖，看見他幾十年來的希望真的成爲事實，他就歡喜得「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醒人事」。他母親把他救活以後，他就成了瘋子。後來有人出了個主意，叫他平常害怕的胡屠戶來打了他一嘴巴，他的神志才恢復了過來。通過這樣兩個小人物的悲喜劇，「儒林外史」寫出了科舉制度是怎樣深入人心，而描寫范進中舉以後他的丈人胡屠戶就對他完全改變了態度，從輕視變爲尊敬，而且馬上就有鄉紳來送銀子，送房屋，送田產，又有些破落戶來投身爲僕人，這更說明了他們爲什麼那樣熱中科舉。科舉是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到達封建官僚的道路。封建官僚的剝削是很驚人的。周進沒有考取秀才的時候，在鄉村當私塾教師，每年館金不過十二兩銀子，而作一個知縣，以小說中的廣東高要縣爲例，就一歲之中，不下萬金。即使還沒有考到可以做官的等級，有個起碼的「功名」，也就有許多便宜

可佔，利益可圖。在周進、范進以後，「儒林外史」還寫了不少的人物，從更多的方面來揭露科舉制度是怎樣統治了當時的一般人的頭腦，是怎樣使人精神墮落，並且可以墮落到什麼程度。馬二先生二十多年來科場不利，但仍然把科舉看作天經地義，毫不懷疑。他那誠懇地宣傳舉業至上主義，宣傳「顯親揚名」，「榮宗耀祖」的封建思想。「俗氣不過」的魯翰林也是舉業至上主義者。他把根本不能算作文章的八股文抬高到這樣的地步，他說：「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便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捆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在他的薰陶之下，他的女兒魯小姐也在曉妝臺畔，刺繡牀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正像「紅樓夢」中賈寶玉所說的，「好好的一个清淨潔白的女兒」也「入了國賊祿鬼之流」。當她發現她的夫婿並不長於此道，她就自然深為不滿，難免含愁帶恨了。吳敬梓十分別致地描繪出這樣一個「才女」，也正是寫科舉制度入人之深。匡超人原來是一個心地純厚的少年，用自己的勞動來養活父母，生活在貧苦然而正直的家庭裏面，然而科舉破壞了他的淳樸的生活。由於當時的社會風氣，加上馬二先生對他所作的舉業至上主義的宣傳，他在殺豬、磨豆腐、靠做小買賣過日子的時候，也不忘夜讀八股文，揣摩八股文的作法。這樣得到了知縣的賞識，並且考取了秀才。但中了秀才就是他的墮落的開始。到了後來，他完全成爲一個吹牛說謊，忘恩負義，不知羞恥爲何物的無賴。通過了這樣一個人物的故事，作者十分明白地表示出他所鞭撻的是整個科舉制度，並不是某些個別的人。嚴貢生，不過是一個區區貢生，然而他在鄉里是何等橫行霸道，作威作福，他用流氓手段來掠奪別人的牲口，欺壓船家和水手，霸佔二房的家產，那樣一些描寫都是「儒林外史」

裏面的很生動的場面。像嚴貢生那樣醜態不堪，從根本上說當然是封建剝削階級的本性的一種表現，但貢生的頭銜也是他的橫行鄉里的護身符。經過科舉的階梯爬到了官僚地位的人又是怎樣呢？「儒林外史」也給我們描寫了一些貪污、胡塗、無知和殘酷的知縣知府。吳敬梓反對科舉制度，就不能不批判到從科舉出身的官僚。封建官僚政治的腐敗，從根本上說來，並非決定於科舉制度，而是決定於這種上層建築本身所代表的階級的利益和特點。但小說中所描寫的那些官僚那樣無知，比如中了進士，後來「欽點山東學道」的范進竟至不知蘇軾為何人，那也的確是帶有科舉制度的特點的。吳敬梓對於當時的政治的批評，還不止於從反對科舉制度出發而涉及的範圍。他在「儒林外史」中寫出了虞育德、莊紹光、杜少卿、蕭雲仙那樣一些正直的人，無論是文人還是武人，無論是學者還是名士，都是不得志的，和圍繞他們的環境不調和的，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對於當時整個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都懷抱不滿了。

「儒林外史」對於某些封建道德的虛偽的揭露也是很引人注目的。雖說有些封建道德，比如孝弟，吳敬梓把它們當作很重要的美德，在小說中加以宣揚，加以理想化，然而他却又從現實中感到了並且寫出了兩種虛偽。一種是許多在口頭上講封建道德而在行為上却剛好相反的虛偽；一種是某些封建道德的本身的虛偽。像王德、王仁，一個是府學廩膳生員，一個是縣學廩膳生員，嘴裏說「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但眼睛裏看見的，心裏想着的却是銀子。他們受了賄賂，就毫無心肝地在他們的親妹妹害病害得快要死去的時候，忙着幫助妹夫嚴監生把小老婆立為正室，而且替他做了一篇「甚是懇切」的「告祖先的文」，告過祖宗，然後舉行扶正典禮，而他們的親妹妹就

在這「大廳、二廳、書房、內堂屋、官客並堂客，共擺了二十多桌酒席，吃到三更時分」的熱鬧中斷了氣。像五河縣的那些余、虞兩家的進士、舉人、貢生、監生、秀才，不送自己族中的長輩人節孝祠，却成羣結隊地恭恭敬敬地去送「又是鄉紳，又是鹽典」的外姓富豪家的死人。從這一類現象，作者不能不感到封建道德在金錢和勢力的面前的完全破產。寫王玉輝的女兒自殺殉夫，那是尤為深刻的。按照書中的描寫，王玉輝是一個「做了三十年的秀才」的「迂拙的人」，而且立志編纂「一部禮書、一部字書、一部鄉約書」來「嘉惠來學」。這樣的人應該屬於作者心目中的肯定人物之列。然而由於他對於封建道德的堅決的信奉，他鼓勵他的女兒自殺殉夫。他向他的女兒說：「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吧！」他的妻子罵他「越老越獸」，他仍然堅持他的看法，認為這不是她所能理解。等到他的女兒真的絕食殉夫以後，他對他的老伴說：「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接着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但他到了大家送他的女兒入烈女祠舉行公祭的時候，他却「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以後因為在家天天看見妻子悲慟，就到外地去遊玩，藉以排遣。但他「一路上看着水色山光」，仍然「悲悼女兒，悽悽惶惶」。到了蘇州，他看見婦女穿着鮮艷的衣服，在遊船裏坐着吃酒，他的迂腐的道學氣使他在心裏想道：「這蘇州風俗不好，一個婦人家不出閨門，豈有個叫了船在這河裏游蕩之理。」但當他看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却又想起了他的女兒，「心裏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這樣一段有名的常被引用的描寫，十分動人地表現出來了吃人的禮教的本質，表現出來了封建統治階級所提倡的烈女殉夫之類是多麼野蠻、殘酷，多麼違反人性。作者就這樣一個有道學氣的

人物在這樣一個事件上寫出了他的內心矛盾，他的精神分裂，他所信奉的封建教條和作爲一個普通人的父愛與良心的衝突，就像一把犀利的劍一樣一直刺到了封建道德封建禮教的深處。

「儒林外史」的辛辣的諷刺還投向了慳吝的地主，投向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幫閑。嚴監生、胡三公子都是「有錢癖，思量多多益善」的人物。嚴監生因爲心痛燈盞裏點了兩根燈草，費了油，以至臨死伸着兩個指頭，不肯斷氣，這個場面是讀過這部小說的人都不能忘記的。慳吝，那是貪婪的一種表現形式，正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特性之一。作者在這部小說裏嘲笑了這種剝削階級的特性，而對於各種輕視金錢的人物却給予了同情和讚揚。和封建官僚相勾結，和高利貸剝削相結合並且本身常常也是大地主的鹽商，也是這部小說裏的一種嘲諷的對象。書中嘲諷了他們的冒充風雅，忌諱自己的出身的微賤，並且揭露了他們的驕奢淫佚，仗勢欺人。此外，作者還描寫了一批依附封建地主階級和鹽商生活的幫閑，一批「斗方名士」。這類人物的心理，可以用牛浦郎的想法爲代表。牛浦郎在牛布衣的詩稿上看見題目上寫着「呈相國某大人」、「懷督學周大人」等等之後，就想道：「可見只要會做兩句詩，並不要進學、中舉，就可以同這些老爺們往來，何等榮耀！」牛浦郎這樣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廝，突然有此念頭，而且從此就墮落到卑鄙無恥的地步，在描寫過程上好像有些不近情理，然而作者的用意却是想通過這樣一些人物，從科舉制度以外的另一個方面來寫出當時的社會的腐敗。這樣一些人物的存在，不但是由於想和達官貴人往來的虛榮心，而且由於這樣就可以過寄生的生活。在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羣衆的上面，存在着龐大的不勞而食的社會層，其中不但有官僚、地主，而且還有各種各樣的寄生蟲。這正是封建社會的真實面貌。

概括說來，「儒林外史」所批判的事物主要就是這些。雖然它還不會對整個封建社會制度提出懷疑，只是批判了一些醜惡的事物，這些批判仍然是引向了一個總的結果，仍然是批判了封建社會。吳敬梓是以「功名富貴」、「文行出處」這樣八個字來作爲他所反對的和肯定的人物的分界。他認爲熱中「功名富貴」就必然會看輕「文行出處」，講求「文行出處」就必然會輕視「功名富貴」。而科舉制度正是追求「功名富貴」的主要道路，也是敗壞「文行出處」的主要道路。這就是吳敬梓企圖通過「儒林外史」來表現他的基本思想。從我們今天的觀點看來，決定封建社會必然日趨腐敗的並不是它的個別制度，而是整個的封建制度和整個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然而，正和其他傑出的現實主義的作品一樣，「儒林外史」描寫的社會生活所表現出來的客觀意義，是遠爲超過了作者的主觀意圖的。它通過對以上所說的那些醜惡的事物以及其他事物的批判，使人感到整個的封建社會、整個的封建統治是不合理的，應該爲一種新的健全的東西所代替。這就是「儒林外史」在它的思想性方面的最重要的成就。

由於滿清統治者的恐怖的文字獄的威脅，吳敬梓把他的小說中的故事假托爲發生在明朝中葉，發生在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之間，但他所批判的實際是滿清政府統治之下的十八世紀的中國封建社會。滿清以異族侵入中國，經過幾十年的鎮壓和經營，這時它在全國的統治已相當鞏固。滿清初年的大屠殺大洗劫所嚴重破壞的農業和工商業這時也得到了一些恢復。然而，隨着這個最後的封建王朝的政權的穩定，土地日益集中在官僚、地主的手裏。對於工商業的發展，滿清統治者也採取的是壓迫和阻礙的政策。這就是說，滿清的統治的鞏固是不利當時的社會的發展的，它的作用不過是使

垂死的封建社會的生命得到了若干時候的延長而已。而且由於不斷的戰爭和官吏的貪污成風，當時人民的生活是很窮困的。「儒林外史」就主要是反映了這樣一個封建社會的內部的腐朽。它對於當時人民的生活的窮困和地主階級的殘酷的剝削也曾略為涉及，但因為它的題材主要是「儒林」，它着重地從和封建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關係比較密切的一些方面來批判了這個腐朽的封建社會。雖然這個處於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社會的問題和醜惡的事物並不只是這些，「儒林外史」的題材和它着重從這些方面來批判封建社會，使它在中國古代的為數很少的幾部最為傑出的白話長篇小說中具有獨自的特色，獨自的成就，而它就以它的這種特色和成就來豐富了我國古代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寶庫。

三

吳敬梓自己就是一個封建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他生在一個「科第仕宦多顯者」的家族裏。他的家庭本來是相當富有的，由於輕視金錢，熱心幫助別人，他沒有多久就把家產揮霍光了。三十三歲的時候，他從他的家鄉安徽全椒移居南京，過着貧苦的生活，有時竟至斷炊。程晉芳在給他做的傳記中說：「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聖×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環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這個故事真切地寫出了他的貧苦的生活和他不向貧苦低頭的性格。一七三五年，他三十六歲的時候，當時的安徽巡撫曾打算推舉他入京去應「博學宏辭」的考試。「博學宏辭」，這是滿清統治者爲了網羅特殊的人才而設的特殊的考試。一六七八年，滿清統治者曾經舉行過一次來收買從明朝遺留下來的有

名的文人學者，隔了五十多年才舉行第二次，所以被薦舉去應這種考試，在當時的讀書人中被認為是一種很光榮的事情，很難得的機會。然而吳敬梓却藉口害病，拒絕不去。這樣一個人，生活在像「儒林外史」所描寫的那樣腐敗和勢利的社會裏面，生活在那樣一些庸俗和無恥的知識分子中間，是會感到怎樣的孤獨，怎樣的悶氣呵！要不和卑鄙的黑暗的現實妥協，也不被它壓倒，一個人必須有理想。而一個文學家，更正是由於他有理想，然後才可能站在比現實更高的地方來觀察它，描寫它，然後才可能正視卑鄙和黑暗，而且並不把它們描寫得只是可怕，只是令人窒息。

如果說吳敬梓所批判的事物是很好理解的，他的理想和他根據這種理想而寫出的一些肯定人物却就比較複雜，比較不易說明。作為理想人物來寫的第一回的王冕，是元朝末年的一個真人，然而「儒林外史」的王冕的故事並非全是真事。根據宋濂的「王冕傳」，王冕是以豪傑之士自負，還是頗有一些鋒芒的。在吳敬梓的筆下，他就恬淡和平得多了。在這個人物身上，有這樣幾個特點。第一，他「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一不貫通」。他的政治見解是儒家思想，主張「以仁義服人」。但是，第二，他不願做官，也不願見做官的人。他拒絕了元朝的知縣的邀請，也逃避明朝的皇帝朱元璋的徵聘。他以段干木、泄柳為他的模範。泄柳和段干木是春秋戰國時候的隱居的賢士，當時的國君親自到他們家裏去見他們，一個閉門不納，一個踰牆逃走。第三，他小時放牛為生，後來也安於貧賤，以賣畫來維持自己的生活。這幾個特點大體上是包括了吳敬梓的理想的主要內容的。除了王冕而外，差不多和那些因為熱中功名富貴而精神空虛以至精神墮落的人物在全書中所佔的比

重相當，作者還描寫了許多肯定人物，以他們來和那些精神空虛精神墮落的人物相對照。這些人物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尊重自己的個性或理想，不願爲功名富貴而屈辱自己。但是，爲了把吳敬梓的理想性質分析得明確一些，我們還必須把這些人物加以區別。

莊紹光、遲衡山這樣的人可以算作第一類。莊紹光，作者借書中一個重要人物杜少卿說，他是「我所師事之人」，又說他不耐和詞客相聚。雖然他並不熱中做官，但有人薦舉他入京去見皇帝，他還是去了。他說，「我們與山林隱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禮是做不得的。」入京後，看到「我道不行」，才又回到南京，「著書立說，鼓吹休明」。遲衡山也輕視科舉，瞧不起詩賦，他的最高理想是經史上的「禮樂兵農」。他說，「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湯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禮樂。」他生平所作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倡議在南京蓋一所泰伯祠。他說，「春秋兩仲，用古禮古樂致祭，借此大家習學禮樂，成就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這樣的人實在很有道學氣味，他們的理想不過是一種理想化了的封建思想，道地的儒家的正統派思想。遲衡山的倡議得到了實現，用古禮古樂祭泰伯祠成爲全書中的一個最重要的事件，書中並誇張爲「兩邊百姓，扶老攜幼，挨擠着來看，歡聲雷震」。泰伯祠的主祭虞博士，書中說他是「真儒」，說他是「聖賢之徒」，按道理他的思想也應該是儒家的正統派思想，然而書中却把他寫得隱逸氣味很濃厚。杜少卿稱他爲「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節一流人物」。這裏可見吳敬梓心目中的聖賢，並不一定必須是孔孟，也可以是伯夷、柳下惠、陶淵明那樣的人。虞博士那樣的人特別被推崇，還因爲他能够用自己的行動來感化人。作者借書中一個人物的嘴來說：「看虞博士那般舉動，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樣，已

是破了他的德化，那非禮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來。」根據向來的說法，虞博士、莊紹光都是以當時的實有的人物爲模特兒來寫的。虞博士說是寫的當時江寧府學教授吳蒙泉，莊紹光說是寫的程廷祚。吳蒙泉的爲人到底如何，我們已經不大清楚。但關於程廷祚却還有許多材料可考。程廷祚是一個早年相信顏元、李塨的學說，後來却調和於顏李學派和程朱學派之間的道學家。書中寫的莊紹光的某些經歷是和程廷祚的生平相近的。然而，把書中的人物和他的模特兒相比，顯然作者也是加以理想化的。程廷祚並非那樣「恬靜」，那樣襟懷沖淡。他一七三五年，應「博學宏辭」科沒有考上；一七五一年，已經是六十一歲的老頭兒了，又到北京去應「經明行修」的考試，結果又沒有考上，而且頗有些悻悻然，寫了一封「南歸留上海寧陳相國書」，說這兩次考試都取的人很少，這位「陳相國」沒有講話，違背滿清皇帝的求賢之意，並最後以古人「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自比。

這哪裏像小說中的莊紹光那樣瀟灑自得呢？「儒林外史」的後一部分還寫了一個蕭雲仙。他雖是武人，却讀過史書。他鎮守邊疆的時候，鼓勵居民開墾田地，並動用錢糧來興水利，開溝渠。然後是建立先農壇，行祭祀之禮，並且開辦學堂，教居民的孩子讀書識字。這個人物好像就是爲了實現遲衡山的全部理想「禮樂兵農」而描寫出來的一樣。然而，遲衡山的古禮古樂也好，虞博士的以德化人也好，都一點也不能挽救當時的封建社會的腐敗，而且最後這些人物也不能不風流雲散，銷磨

● 據「清史稿：大學士年表一」，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大學士中有陳世倌。陳世倌是年三月重入閣，四月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九月，管禮部。任職至乾隆二十三年。又「清史稿：列傳九十」：「陳世倌字棄之，浙江海寧人。」此陳相國當即陳世倌。